

“三段式神仙镜”的图像研究*

苏 奎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 邛崃市文管所收藏有一枚东汉晚期的三段式神仙镜。本文在对比相似铜镜图像的基础之上, 详细解读该镜的图像内容、构图蕴意和艺术风格。这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四川地区发现的三段式神仙镜。

关键词: 三段式神仙镜; 西王母; 东王公

中图分类号: K87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08)04-060-06

邛崃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收藏有一枚东汉晚期^[1]的“三段式神仙镜”(以下简称“邛崃三段式神仙镜”)。据说是 1976 年邛崃羊安镇汉墓中出土。该镜保存完好, 制作精美, 表面有“黑漆古”, 直径为 17.5 厘米, 厚 0.5 厘米。镜面略呈弧形。镜背中央为半球形的钮, 其中带穿, 圆形钮座, 钮径 3.1 厘米, 高 1.4 厘米。镜背纹饰以铭文带为界, 可分为内、外两区, 外区从外至里分别由宽素缘、连续多边形卷云纹带与栉齿纹带组成, 内区则由镜钮和由两条平行横线分割成上中下三段的浮雕图案组成。

此镜上段中央为一龟趺, 其上立一伞状华盖, 华盖右侧坐有一仙人, 居于显要位置, 头梳大髻, 跏趺, 双手笼袖放于膝上, 肩生双翼; 其后右侧有一人坐于兽背上; 其后左侧有两人坐于凭几高台上, 手捧笏状物。华盖的左侧有三人, 一须髯老者手持节杖, 面向右侧仙人躬腰而立; 其后一人头戴高冠, 拱手朝向右侧仙人作揖拜状。其后一人形体矮小, 头顶有长髻, 背后有长尾, 作蹲踞状。中段镜钮两侧各正坐一仙人, 左侧为东王公, 头戴山字形冠, 肩生双翼, 双手笼袖, 跏趺于双兽背上, 双兽背向, 一兽回首; 右侧为西王母, 头戴胜, 肩生双翼, 双手笼袖, 跏趺于双兽座上。双兽座下均饰卷云纹。下段中央置一两相缠绕的神树, 上部枝蔓向两侧延伸, 树下两侧各坐两名仙人; 树之右侧二人相向而坐,

其中一羽人头戴山字形冠, 肩生双翼, 一手上举, 掌心向外; 另一人头戴高冠, 双手捧笏状物, 跏趺作揖拜状; 树之左侧有二羽人, 肩生双翼, 双手笼袖, 并排而坐。

铭文带上的铭文为阳文, 书体为隶篆体, 从三个圆形乳突开始呈顺时针刻写, 较为清晰, 共有二十八个字。铭文中多数为正刻, 少数为反写, 给释读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初步释读为: “余造明镜, 九子作, 上仙神圣, 西母东王, 央赐妻元女, 天下泰平, 禾穀孰(熟)成”(图一)。

这种由两条平行横线分割成上中下三段, 重



图一 邛崃三段式神仙镜

* 本文为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2006 年重点资助项目成果之一。

列分布着浮雕人物图像的铜镜，被中外多数学者命名为“三段式神仙镜”^[2]。迄今为止，三段式神仙镜曾在国内四川、陕西、浙江等地出土过，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日本和美国的博物馆也都有些传世作品，金石著录等也有相关的记载，共计约二十余枚。虽然这些铜镜在匠意设计上均有几分“形似”——内外分区的中上中下三段式样大致相似，但是镜背纹饰差异较大，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型式。也许，能够看出它们之间其实“神不似”——不同型式的三段式神仙镜可能有不同的来源和用意^[3]。

从目前发现的三段式神仙镜材料观察，在以铭文带为主要区别的三段式神仙镜当中，与邛崃三段式神仙镜相似者仅有三枚。其中，四川绵阳何家山一号崖墓出土一枚^[4]。该镜表面有“黑漆古”，镜面略呈弧形，直径18.2厘米。以铭文带为界，分作内外两区。外区从外至里分别由宽素缘、连续多边形卷云纹带（每个多边形卷云纹的头、尾处有一小节齿纹）与栉齿纹带组成。内区中央置半球形钮，有穿，钮径2.9厘米，高1.4厘米。圆形钮座，钮座外重列上中下三层图案。上层中央立伞状华盖于龟趺之上，华盖右侧坐有一人，形体较大，居于显要位置，肩生羽翼；其前侧立一羽人，双手捧笏状物，跽坐作揖拜状；其后二人，站者穿右衽衣，坐者穿圆领衣，二人之间立一鸟。华盖左侧有三人，一羽人头戴山字形冠，面向华盖立柱躬腰而立；其后二人穿右衽长袍，站者肩生羽翼，右手上举一圆形物，坐者左手持笏状物。中层为东王公，头戴山字形冠，跽坐于双兽脊背上，双兽背向；左为西王母，戴胜，跽坐于龙虎座之上。龙虎和双兽均卧于卷云纹座上。东王公、西王母均穿右衽衣，肩生“S”形羽翼。下层中央有神树，枝干呈“8”字形相互缠绕，上部枝蔓向两侧延伸；树下两侧各有二仙人，左侧二羽人相向而坐，其一头戴山字形冠，左手放于膝上，右手舒掌上举，掌心向外；另一人亦戴冠，双手持笏状物，下跪作揖拜状；树之右侧，二羽人排坐，面向相对，作交谈状。铭文带上的铭文为阳文，书体为隶篆体，从圆形方孔钱纹图案开始呈顺时针书写，较为清晰，共有46字。初步考释为：“余造明镜，九子作容，翠羽秘盖，灵鹄台杞，调（鵠）刻神圣，西母东王，尧帝赐舜二女，天下泰平，风雨时节，五穀孰（熟）成，其师命长（图二）”。



图二 何家山三段式神仙镜

上海崇源国际2006年秋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上有一枚三段式神仙镜（拍卖品编号为0016；名称为“余造明镜神人神兽画像镜”；时代为“东汉晚期”）^[5]。该镜与何家山三段式神仙镜相比较，除了铜镜的形制略有差异外，其余大小、铭文和纹饰等几乎完全相同。该镜外缘有对称的分融线，若浅葵状，似隋唐葵花镜之鸟形（图三）。

美国西雅图美术馆收藏有一枚三段式神仙镜^[6]。该镜直径18.8厘米，外区纹饰由外至里，分别为宽素缘带、连续四边形卷云纹带和栉齿纹带。内区图案分为上中下三段，上段正中为龟趺，其



图三 崇源三段式神仙镜

上立有华盖，华盖右侧一神仙正坐，其左上方有两人侧坐，右侧有一人侧坐，作侍奉状。华盖的左侧有三人，均面朝正坐之神仙，或躬或坐。中段钮之两侧，为东王公与西王母之相对正坐像，东王公与西王母均坐于双兽座上。下段正中为两支相互缠绕的树木向两侧伸展开，树之右侧有两仙人排坐，面向相对，作交谈状；树之左侧有二仙人，其中右者跪坐，肩生羽翼，右手上举，掌心向外，左手置于膝上，左者面向右者，双手持笏状物，下跪作祭拜状。铭文带上的铭文为阳文，书体为隶篆体，从圆形方孔钱纹图案开始呈顺时针书写，较为清晰，共有44字。初步释读为：“余作明竟大无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羊（祥），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宜侯王，乐。”（图四）



图四 西雅图三段式神仙镜

笔者在细致观察上述几面铜镜的基础之上，重点对邛崃三段式神仙镜的图像进行解析。

二

（1）镜背画像内容的解读

对于该镜画像内容的解读，可参考相似铜镜的研究成果。学界对此有较多的论述，基本一致认为中段镜钮两边的画像分别为东王公与西王母。根据文献的记载和图像志的考察，我们知道西汉中期西王母信仰开始兴起，西王母图像也随之出现。并随着西王母信仰的兴盛，其图像也不断演变。但是不同区域之间的图像差异较大。在

四川地区，西王母图像自始至终有其典型特征，就是头戴发髻（或“胜”），并坐于“龙虎座”之上。东汉中期章帝、和帝之间（公元76~105年）^[7]，东王公作为西王母的镜像开始出现，并与西王母对置或并置，较多的出现在石刻、壁画和铜镜上，其典型的特征是头戴山字冠、下颌长须。因此，二者的特征十分明显，容易识别。况且有镜铭“西母东王”与之呼应，因而可以肯定中段镜钮两边的画像为东王公与西王母。

但是，对于铜镜上段与下段图像的认识，尚存分歧。上段中央为一龟趺，其上立一伞状“华盖”。巫鸿先生认为，以伞盖和龟座二图像组成老子的“华盖之座”，是为老子所设的在祭祀时接受供品和礼拜的“位”，是老子“真形”的视觉象征或隐喻表达^[8]。华盖右侧显要位置跪坐有一肩生双翼的仙人。林巳奈夫认为伞旁那个有翼神人是以北极星为其象征的天皇大帝^[9]。霍巍先生则将何家山三段式神仙镜上的图像与铭文联系起来解释，认为“原发掘简报推测，此镜上段中央华盖右侧正坐之神仙，当为帝尧，有一定道理，我认为表现的是尧或者舜均有可能，而以舜的可能性更大”^[10]。下段中央为枝干呈“8”字形相互缠绕的神树。由于其形象与《山海经》所记载的一类神树有相似之处，因此学界基本一致认为它就是古代神话传说中，位于大地中心具有通天功能的“建木”。对于树下两侧的主要人物，林巳奈夫先生认为应当是与天皇大帝有关系的神农和苍颉二神^[11]。霍巍先生结合何家山三段式神仙镜的铭文观察，认为有可能考虑为帝尧赐舜之“二女”及其随从之类地位又低一级的神仙^[12]。这些解释对于邛崃三段式神仙镜图像的认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囿于目前的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尚无法对邛崃三段式神仙镜上下段的图像作更进一步的解读。

（2）“三段式”构图的蕴意

邛崃三段式神仙镜的内区由两条平行横线分割成上中下三段，其构图应当不是随意的，而是与当时流行的思想观念有一定的联系。正如帛画、壁画、画像石中那些并非纯艺术而有实用意味的象征性图像里，包含了某些真实的想法。其中，最显著的是人们对于未知世界的想象^[13]。

同样，有着上、中、下三层图案的“三段式神仙镜”更多的是表现神仙体系。就邛崃三段式神仙镜而言，其上段中央为庄严的伞状华盖，左

侧的揭拜人群向右侧的端坐之神作鞠躬礼拜状,应当表现的是“天界”。中段凸显东王公与西王母,应当是表现的“仙界”。下段中央为“连理树”或“建木”,右侧为端坐的两羽人作交谈状,左侧为揭拜图,应当表现的是“人界”。无论是天界还是人界,都有羽翼仙人的出场,与中段的东王公与西王母一起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神仙体系:人界的信徒祈求普通仙人,希望通过仙界的西王母,上升至天界并拜见天神。

这样的构图在汉代画像中多有表现,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武梁祠画像。巫鸿先生在《武梁祠》一书中谈及武梁祠的浮雕画像时指出,“这座小小的祠堂能够使我们形象化地理解东汉美术展现出的宇宙观。其画像的三个部分——屋顶、山墙和墙壁恰恰是表现了东汉人心目中宇宙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天界、仙界和人界”^[14]。

当然,“在以图形为主的考古资料中我们也能够体会到秦汉人的知识背景和思想水平,秦汉时代的人们基于经验,以为象征和象征所模拟的事物或现象之间有某种神秘的关系,于是那些画像图像类的东西可能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艺术品,而有某种神秘的实用意”^[15]。实际上,该镜的真实用意又正好反映在镜铭的几层意思里,因为作镜用镜之人始终相信铜镜上的铭文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得到应验。铭文“上仙神圣,西母东王”无疑是对神仙体系“仙界”的想象,而“央賜妻元女,天下泰平,禾穀孰(熟)成。”则是对现实社会生活“人界”的描绘。如果说镜上图像更多是对神仙体系的想象,那么镜铭则更多是对现实愿望的表达。自始至终,铭辞与图纹是紧密配合、呼应的。

(3) 西王母图像的位置

虽然邛崃三段式神仙镜与何家山三段式神仙镜、崇源三段式神仙镜和西雅图三段式神仙镜极其相似,但是它们镜背铭文带内区的图案之间还是存在着细微的差别。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镜背上段纹饰图案大致相似,而中段和下段图案内容相似,但其位置相左。中段,西王母与东王公的位置相反。崇源、何家山和西雅图三段式神仙镜的西王母在左,东王公在右;而邛崃三段式神仙镜则东王公在左,西王母在右。下段,“8”字形树下左右两侧人物图案的位置相反。崇源、何家山和西雅图三段式神仙镜的树下右侧为两仙人排坐,面向相对,

作交谈状,左侧为二仙人,其中右者跏坐,肩生羽翼,右手上举,掌心向外,左手置于膝上,左者面向右者,双手持笏状物,下跪作祭拜状。而邛崃三段式神仙镜则刚好相反,右侧为二仙人,其中右者跏坐,肩生羽翼,右手上举,掌心向外,左手置于膝上,左者面向右者,双手持笏状物,下跪作祭拜状。左侧为两仙人排坐,面向相对,作交谈状。

两处图案位置的变化,涉及到当时人们的方位观念问题。解读这两处图案的关键之处在于西王母图像的位置。两汉时期,受某种神秘因素的影响,使得神话传说中的西王母神话上升到哲学宗教性质上的西王母信仰,但它至始至终都与历史地理上的西王母有密切的联系^[16]。根据文献典籍,与西王母所处方位相关的记载大致有以下几处:

《庄子·大宗师》记载:“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17]。所谓“少广”,历来被认为可能是西方的某一地名。

《山海经·西山经》记载:“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18]。

《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19]。

晋郭璞注《尔雅·释地》曰:“孤竹在北,北户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东,皆四方昏荒之国,次四极也”^[20]。

《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乃遂西征。亥,至于西王母之邦。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21]。

《竹书纪年》记载:“周穆王十七年,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王母止之”^[22]。

《淮南子·坠形训》记载:“西王母于流沙之濒”^[23]。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瓮……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24]。

《论衡·恢国》记载:“西王母国在绝极之外,而汉属之,德执大,坏执广”^[25]。

《汉书·地理志下》记载:金城郡临羌县,“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26]。

从这些文献记载看,“西王母”所处的方位均在西方。有时候,“西王母”也成了方位之西方的代名词,虚指西方极远之处,而有时也实指我国西北之某地。至于其具体的地理位置,应与当时中国人对西方的地理背景和认知水平有密切的联系,并随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可以肯定的是,学界基本一直认为西王母与西方有一定的联系。东汉及其以前,西王母居于西方的观念早已形成,并且相当固定,以至于流传至今。

然而,当人们将这种方位观念映射到器物上时,却产生了分歧。一般说来,左为西、右为东的方位观念在人们心中业已达成共识。但是,参照物的变化使得左右所指的方位也有所变化,甚至相反。有时以器物自身的角度来确定左右,有时又以观者的角度来确定左右,可以视情况而定的。在四川地区流行的西王母龙虎座上就可以见到此情形,青龙和白虎在西王母左右的位置是不完全确定的,即有些图像中龙在左虎在右,而另一些图像中又是虎左龙右。李淞先生认为:“与左右的定义有关,即可以以西王母自身的角度来确定左右,也可以以观者之左右来确定——二者恰好相反。前者为本意,后者为变义”^[27]。笔者认为此说有一定道理。

但是,就本文所讨论的邛崃三段式神仙镜而言,它显得更为特殊。与西王母龙虎座可以从观者或西王母自身的角度来确定左右相异的是,铜镜背面图案为平面造型,因此以观者的角度来确定其左右的可能性更大。在目前发现的各式西王母神兽镜中,西王母图像绝大多数被置于镜钮的左侧。这表明当时人们的方位观念是相当明确的。然而,它出现错位或换位的原因,可能与制作者本身的知识水平或文化背景有关。加之,该镜铭文少数为反刻,似乎也反映出当时以民间工师为代表的少数普通知识阶层的知识水平和文化背景,即手工技艺知识主要是凭借自身经验的积累或通过口授心传而传承延续的,因而出现别误也在所难免。再如,汉镜铭文中的通假、错别、减笔、省偏旁和反写是经常有的,掉字漏句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尤其,东汉的中晚期,私人铸镜更盛。民间刻工水准不一,故镜铭所见俗讹、简省和通假字极多,甚至难以确认,须通读全铭,并参照内容相近或相关的铭文,才能辨识。且时代愈晚,简讹程度愈大。^[28]当然,在图像制作过程中,模制程序或粉本传写也可能使左右颠倒。

(4) 对“龙虎座”的认识

邛崃三段式神仙镜上西王母所凭依的双兽座通常被国内学界大多数学者称之为“龙虎座”。西王母与龙虎座的结合是四川地区西王母造型中的独有图像,并成为四川地区西王母图像的最大特色或首要特征,龙虎座也就成了西王母王者之尊的身份象征。西王母在“龙虎座”的映衬下出场,往往是以单体像的形式出现,少有西王母与东王公的成对像。从目前的考古材料观察,在东汉的中晚期的画像石、画像砖、画像石棺、摇钱树、钱树座、铜牌饰、漆盘和陶灯等不同载体上发现的西王母图像一般均为单体像,而且西王母在图像中的位置往往是位于构图的上部、中央或突出位置,图像比例也相对较大。这些都表明西王母在其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在蜀地一直处于“独尊”地位。

但是,邛崃三段式神仙镜上却出现了西王母与东王公配对构图的式样,并且两者的身下均有双兽座,这一现象值得注意。研究表明,东汉中期东王公作为西王母的对偶镜像,与西王母同时出场。它的出现比较特殊,最先是以图像的形式出现在东汉中期的石刻、壁画和铜镜等器物之上,而东汉及其以前的文献中没有相关记载。东王公作为西王母配对构图的镜像,出现在四川地区发现的三段式神仙镜上,与蜀地西王母独尊构图主流有着明显的差异,打破了四川地区严格意义上的西王母独尊地位。并且,它的身下两侧也有与表征西王母独特身份之龙虎座相似的双兽座,显然是降低了西王母的独尊地位。在检索铜镜材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西王母与东王公配对的图像中,二者均置于双兽座上的情形常见于同时期具有吴镜特色的同向式神兽镜和对置式神兽镜上,西王母与东王公总是处于相对位置。如“刘氏作神兽镜”,二神均为正面端坐,均有翼。西王母又有二兽夹侍,似青龙、白虎,实际上更像四川汉画像中的龙虎座;东王公头戴山字冠,左右为二朱雀夹侍^[29]。上海博物馆藏“永康元年(公元167年)环状乳神人禽兽镜”上,西王母头戴翘的弧形头饰,肩生双翼,左右为龙虎夹侍,东王公亦为龙虎夹侍^[30]。1991年,九江出土的同向式重列神兽镜上,头戴胜、坐于龙虎双兽座上西王母位于镜钮的左侧,而头戴三字冠、坐于双兽座上的东王公位于镜钮的右侧^[31]。类似的构图还比较多,且主要见于东汉中期长

江中下游地区的吴镜之上。由此可以推断,邛崃三段式神仙镜的图像风格应该是受到了吴镜文化的影响。

三

邛崃三段式神仙镜发现的地点据说在邛崃羊安镇,是四川地区除绵阳发现三段式神仙镜以外又一地点。这对于进一步研究四川地区发现的三段式神仙镜提供了新的材料。尤其通过对相似铜镜背面的图像内容和艺术风格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该镜有着自身的独特之处。这对于研究同式三段式神仙镜的产地可能会有新的线索。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邛崃文物局李子军副局长、绵阳博物馆唐光孝馆长、四川师范大学魏启鹏教授的帮助,谨申致谢。)

注释:

[1] 苏奎:《“三段式神仙镜”的发现与研究》(待刊)。

[2] 樋口隆康:《古鏡》,新潮社,1980年,225页。霍巍:《四川何家山崖墓出土神兽镜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2000年第5期。巫鸿:《地域考古与对“五斗米道”美术传统的重构》,巫鸿编:《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和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

[3] 苏奎:《“三段式神仙镜”的发现与研究》(待刊)。

[4] 何志国:《四川绵阳何家山一号东汉崖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3期。

[5] 资料来源于《崇源国际2006秋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图录》。

[6] 巫鸿:《无形之神——中国古代视觉文化中的“位”与对老子的非偶像表现》,巫鸿著:《礼仪中的美术》(下卷),三联书店,2005年,518页,图23-9。

[7] 信立祥:《论汉代的墓上祠堂及其画像》,南阳汉代画像石学术讨论会编:《汉代画像石研究》,文物出版社,1987年,198页。

[8] 巫鸿:《地域考古与对“五斗米道”美术传统的重构》,巫鸿编:《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和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巫鸿:《无形之神——中国古代视觉文化中的“位”与对老子的非偶像表现》,巫鸿著:《礼仪中的美术》(下卷),三联书店,2005年。

[9] 林巳奈夫:《漢鏡の圖柄二、三について》,(日本)《东方学报》第44册,1973年2月,28~34页。

[10] 霍巍:《四川何家山崖墓出土神兽镜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2000年第5期。

[11] 林巳奈夫:《漢鏡の圖柄二、三について》,

(日本)《东方学报》第44册,1973年2月,28~34页。

[12] 霍巍:《四川何家山崖墓出土神兽镜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2000年第5期。

[13] 葛兆光:《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背景与一般思想水平》,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221页。

[14] 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92页。

[15] 葛兆光:《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背景与一般思想水平》,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221页。

[16] 这里涉及到魏晋以前的西王母有三种不同的形相:一是神话传说中的西王母;二是哲学宗教上的西王母;三是历史地理上的西王母。参见王孝廉:《西王母与周穆王》,李亦园、王秋桂主编:《中国神话与传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恩出版社,民国85年3月,306~309页。

[17] 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1982年,96页。

[18] 袁珂:《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6年,59页。

[19] 袁珂:《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6年,466页。

[20] 徐朝华注:《尔雅·释地第九》,《尔雅今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226页。

[21] (晋)郭璞著:《穆天子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卷三,10页。

[22] (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卷七,130页。

[23] 《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6年重印版,63页。

[24] 【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重印版,卷一二三,3163页。

[25] 《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6年重印版,193页。

[26] 【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重印版,卷二八,569页。

[27] 李淞著:《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213页。

[28] 林素清:《两汉镜铭初探》,(台)《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民国82年,第63本,第2分。

[29] 黄睿:《尊古斋古镜集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图62。

[30]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年,图441。

[31] 吴水存编著:《九江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93年,图17。